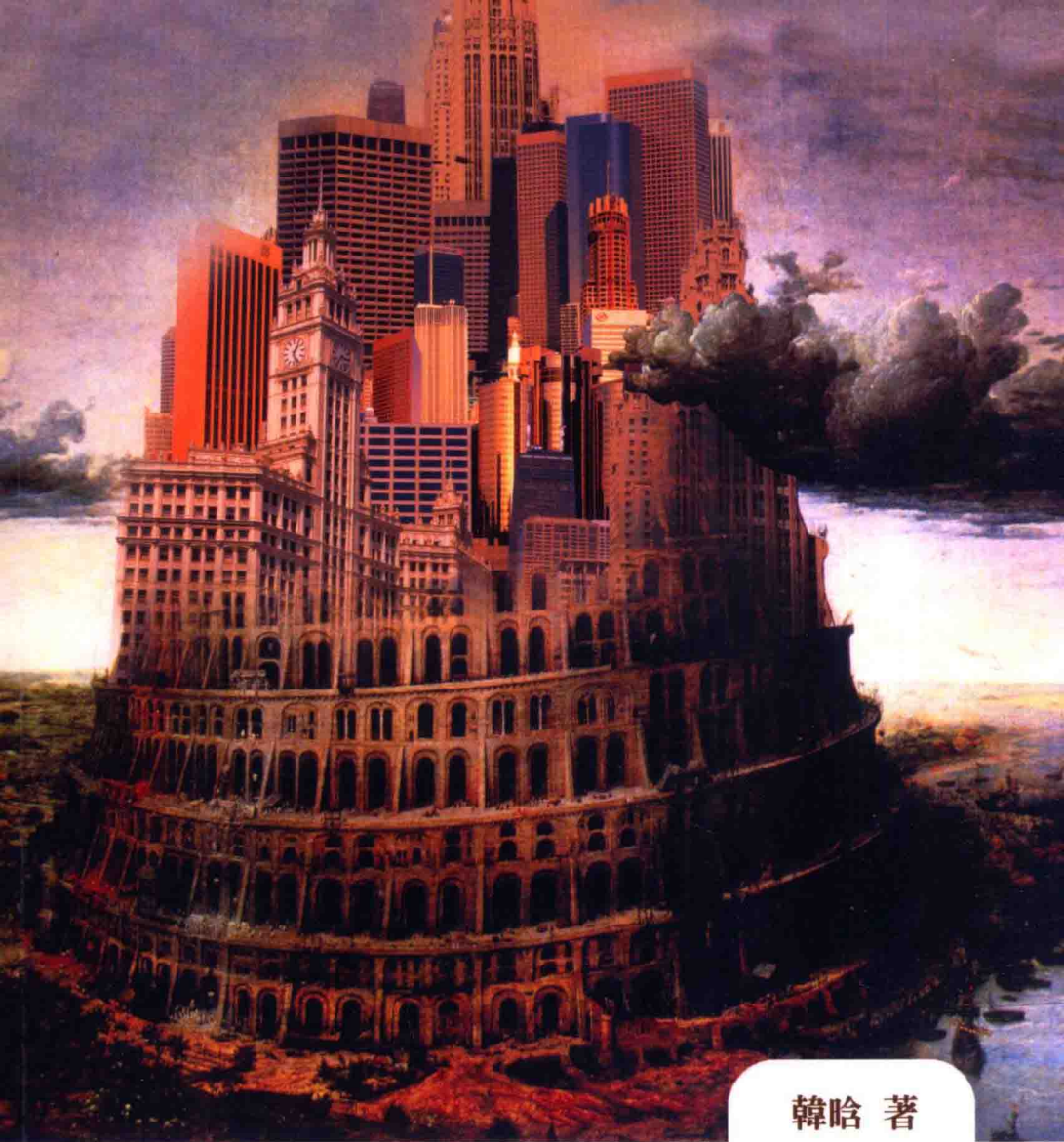




韓晗 著

可敘述的現代性

期刊史料、大眾傳播與中國
現代文學體制（1919～1949）

韓晗 著

可敘述的現代性

——期刊史料、大眾傳播與中國
現代文學體制（1919～1949）

可敘述的現代性

——期刊史料、大眾傳播與中國現代文學體制 (1919~1949)

作者 / 韓 晗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林泰宏

圖文排版 / 陳宛鈴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 年 7 月 BOD 一版

定價：28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謹以此書，獻給我們相識的第九百天

**This book is
contributed to the 900th day since we met**

代序 開墾學術的處女地

——序韓晗《可敘述的現代性》

樊星

韓晗出生於 1985 年，屬於「80 後」。這個年齡段的青年喜歡寫詩、寫小說的不少，喜歡研究文學的似乎不多。而作家陳應松在向
我推薦韓晗時一再強調的一句話就是：「這個人是真的喜歡這個東西
（指文學研究），這樣的年輕人現在真的不多！」後來，我瞭解到韓
晗已經出版了散文集《大國小城》、學術專著《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三
十年》等八種，更感到了應松兄此言不虛。這不，作為一名博士研
究生，入學不到半年，韓晗又拿出了他的最新成果《可敘述的現代
性——期刊史料、大眾傳播與中國現代文學體制（1919～1949）》，
並告訴我，其中的幾篇已經或即將在《書屋》、《汕頭大學學報》等
刊發表。藉此書在臺灣出版之機，韓晗希望我能寫篇序言，我當然
樂意玉成此事。

期刊研究、文學的傳播研究都是近年來學界的熱門話題。關於
那些深刻影響了現當代文學發展的重要期刊的研究，已經有了相當
可觀的成果。韓晗一面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新的學術增長點，一面迅
速進入了對於那些學界一時尚未關注的期刊的研究，通過對原刊的
細緻閱讀、研究，有所發現，從而開拓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園地。例
如《絜茜》、《夜鶯》、《武漢大學文哲季刊》、《吶喊（烽火）》這些學
界的研究顯然還不夠的刊物，韓晗都能拂去歷史的煙塵，還其清晰
的歷史面目，揭示其在歷史上也許不那麼深遠、但不容忽略的文化

意義。這樣，這本書就具有了某種拓展新知、填補空白的意義。同時，韓晗有意在對於不同期刊的研究中剔發不同的文化意義，努力呈現出對於期刊研究的多側面理解，也使得本書具有了搖曳多姿的靈動感。此外，更有意義的是，韓晗能夠走入歷史的深處，去理解那些前輩文化人的追求與迷惘，去發掘那些好像已經湮沒在歷史廢墟中的文化陳跡，我覺得是顯示了一個「80後」學人對於前輩和歷史的濃厚興趣、也是顯示了文心的薪盡火傳的。

現在有不少青年學人，常常習慣從某一西方的流行理論入手去討論問題。然而，西方的理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中國千變萬化的文學現象，卻是一個問題。甚至在西方，對文學評論的理論化傾向的質疑也時有所聞。美國文學評論家韋勒克就曾經指出：「當前迫切的問題……理論是接受了，而與文本的接觸卻越來越少了。」¹因此，如何從對於文本的閱讀感覺入手，去感受、描述文學的豐富與微妙，進而深刻領悟人生的豐富與微妙，就成為避免淪為流行理論附庸的關鍵所在。我在讀了這部書稿以後，感到韓晗既能關注新的理論，並從中攝取研究的靈感，又能不為理論所囿，努力還原文學與歷史的複雜多變，讀來常有移步換景之感。例如〈「遺失的美好」〉一章對《絜茜》月刊的研究對於〈三個張資平〉、〈兩個《絜茜》月刊〉的發現就頗有新意地揭示了中國文人命運的多變；〈知識分子、公共交往以及話語範式〉一章中對《武漢大學文哲季刊》創刊號特色的發現——「『重中輕西』、『昌明國粹』仿佛是《季刊》的辦刊宗旨——這與以歐美留學生為主要撰稿梯隊的刊物似乎十分不符」，同時這一現象也有特別的文化意義：「恰恰因為有著一群優秀的留學生（尤其是歐美留學生）供稿者，他們既有著西學的視野，又有著國

¹ 韋勒克，《大學裡的批評》，《外國文藝》第4期，1987。

學的底子」，做起「昌明國粹」的事業來才別具特色……都能體現出作者從史料的鉤沉、分析入手，去重新發現歷史的風雲變幻、歷史人物的命運多變的求實精神。

另一方面，還應該看到，還原歷史的複雜絕非易事。任何一種文學現象，都與特定的歷史背景、社會問題、人事糾葛纏繞在一起，沒有深厚的學養，是難以透徹地做到「知人論世」的。而深厚的學養，當然是建立在常年的積累基礎之上的。由於作者畢竟年輕，雖然在對於那些「冷門」期刊的研究上能夠有所發現，但當他試圖「以點帶面」評論那些錯綜複雜的思潮時，有時難以做到深處，就顯示了作者之短。例如書中對於現代文學史上唯美主義、民族主義思潮的評述就明顯有簡單化之嫌。因此，這本書雖然已經出版，還是需要進一步打磨的。我相信韓晗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既然他真心地喜歡學問。而且，他還如此年輕！

2010年12月24日於武漢大學

樊星，1957年生，湖北武漢人，當代著名文學評論家、文藝理論家，文學博士，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德國特利爾大學（Universität Trier）客座教授、美國俄勒岡太平洋大學（Pacific University）訪問學者。兼任武漢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新文學學會副會長、湖北省文藝理論家協會副主席等職。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文化與文化批評。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已陸續出版《當代文學與地域文化》、《世紀末文化思潮史》、《別了，二十世紀》、《當代文學與多維文化》、《當代文學新視野講演錄》、《中國當代文學與美國文學》等學術專著，並主編了《永遠的紅色經典——紅色經典創作影響史話》一書，曾獲屈原文藝獎、中國文聯優秀文藝論文一等獎等重要獎項多次，在國內外有著廣泛的學術影響。

目次

代序	開墾學術的處女地 ——序韓晗《可敘述的現代性》	i
導論	建構「群像式」的現代文學史料學研究 ——兼談「二十世紀文學史」的學術困境及其出路	1
第一章	國家意識、文學敘事與學者參政 ——以《新語》半月刊為核心的史料考辨	15
第二章	「遺失的美好」 ——以《絮茵》月刊為核心的史料考辨	31
第三章	知識分子、公共交往以及話語範式 ——以 1930~1937 年《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為核心的 學術考察	55
第四章	獅吼聲何處 ——關於《獅吼》雜誌及其後期文學活動史料考	81
第五章	「怎樣遺忘，怎樣回憶？」 ——以《現代文學評論》為支點的史料考察	103
第六章	「那歌聲去了」 ——重評《夜鶯》雜誌及史料辨酌	123
第七章	從「話語媒介」到「文學場」 ——以《筆談》雜誌為核心的史料考察	147

第八章	烽火中的吶喊 ——以《吶喊（烽火）》週刊為支點的學術考察.....	167
第九章	上清舊文學之弊，下開新儒家之源 ——關於《學衡》雜誌的再思考與再認識.....	193
餘 論	關於現代文學期刊研究的建議與思考	207
後記與致謝		219

建構「群像式」的現代文學史料學研究

——兼談「二十世紀文學史」的學術困境及其出路

天使是插上了翅膀的撒旦，歷史往往隱藏於假像的背後。

——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97

只有在一種特定時間意識，即線性是不可逆的、無法阻止地流逝的歷史性時間意識的框架中，現代性這個概念才能被構想出來。

——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alinescu），1987

—

「二十世紀文學史」¹是一個近些年曾在文學研究界引起強烈反響與高度關注的語彙，此語彙與海外中文研究界的「現代文學」這一名詞在內涵上幾乎保持高度一致，即否定「1949年」在文學史研究上的積極意義，進而認同「五四」不但是現代文學的邏輯開端，更是當代文學的精神來源。若是套用李澤厚的話來講，就是「啟蒙壓倒革命」。

¹ 大陸現當代文學學界對於文學的概念定義時常會陷入「時間性修飾」，即使用某個特定的時間段來定義文學，而這種定義恰恰因為片面性、粗略性而缺乏嚴謹的合法性。譬如「八零後文學」、「九十年代文學」等等，實際上這類界定關於「文學」這一特定語彙的修飾並不能完整、準確地定義這類定義所包含的文學範疇，因為文學的發展並不以人為的時間、國界所限定的。

當然，誰也無法否認「五四」對於中國文學的意義所在，儘管不斷有現代文學學者一再上溯現代文學之邏輯起點為晚清甚至更早²，但他們誰也無法抹殺「五四」的重要價值；同理，我們也不能刻意忽視「1949年」這一特定的歷史時刻，縱然信奉「二十世紀文學」甚至「現代文學」就是「當代文學」³的學者，也無法迴避一個現實：中國文學確實在1949年此處有一個轉彎，並且是大轉彎。

筆者認為，轉彎之後，中國現代文學遂由一條大路分成了兩條路，一條貌如「金光大道」，但卻與前路有著九十度的轉折，大陸學界稱之為「中國當代文學」，另一條看似「通幽曲徑」，但卻是前路之精神延續，大陸學界稱之為「港臺文學」，兩條道路，各有千秋。

問題不言自明，「1949年」作為一個特定的歷史符號，其意義究竟為何？在這裡，我們可以在無數本不同的文學史教材中找尋到五光十色的答案，但是這些答案並非都指向問題的本質。研究界對大陸「現當代文學」分野之態度實質上應證了他們對於政治與當代文學生產關係之態度。因為大部分研究者們都認為，1949年之後，

² 在這裡，筆者更傾向於王德威先生對於文學史發展先承後續關係的認定，即「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同理，「沒有現代，何來當代」亦構成了「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精神關係。「當代文學」雖與「現代文學」屬於兩條不同的路數，但是1949年作為一種政治年代的符號，改變的是文學的精神能指與意識形態代言，但卻未改變文學自身的敘事範式、結構策略與表達形式。

³ 關於「當代文學」（或現代文學），目前在海內外研究界有三種不同的英文翻譯，實際上暗含了對待「現（當）代文學」這一特定內涵的三種不同認識。其一是「modern literature」，這個片語實際上是「現代文學」的直譯，意味著具備「現代性」意識即與啟蒙、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意識形態相聯繫的文學；其二是「contemporary literature」，這個片語則意味著認可「當代文學」具備共時性、開放性這一特質，並將其作為當代文學研究的入手點；其三則是「mandarin literature」，直譯為「白話文文學」，目前這個譯法在香港、澳門以及東南亞學術界比較常用，主要指白話文運動之後的中國文學，該譯法一般暗含了認同「現（當）代文學」在語言、文字上的現代特徵。

政治開始對文學進行全面干預，使得「五四」建立的「文學道統」迅速瓦解，文學不再具備其應有的啟蒙價值，取而代之是類似於《紅旗歌謠》式的詩歌、《金光大道》式的小說與「樣板戲」式的戲劇。政治將文學全面解構之後，使得文學不但「告別五四」，甚至還走向了「五四」的反面。

正視並否定「左傾」思潮對文學的干預，這是必須的前提。但我們本身不應否定一段過去的「歷史」。海頓·懷特（Hayden White）曾有一個著名的論斷：文學是「可敘述」的文本，而歷史是「不可敘述」的文本，事實上，歷史同樣是「不可否定」的文本，我們只能否定某種思潮、某條理論、某個具體的方案或政策，但是我們不能全盤否定一段由人類群體所共同創造的時間維度——譬如一棒子打死「八十年代」、徹底否定「晚清」以及認為「十七年」一無是處。

再將思考重新回歸到問題本身上來，對於「現當代文學」之分野，我們既不必橫加批判，也不必故作無視，1949 年之於中國文學之意義，並非三言兩語可能說清，也絕非一兩位學者甚至一兩代人可以定論，作為生活在「當代史」中的我們，面對已經存在的時間分野、歷史現象，最有效的解讀策略便是在研究範式上尋找突破——對於 1949 年之前的文學，我們該如何研究？對於 1949 年之後的文學，我們又該如何研究？

筆者認為，1949 年這個時間概念，它的意義並不在於文學的生成機制，而在於對於其的研究、解讀機制。因為從長遠的大歷史觀看，1949 年與萬曆十五年、貞觀元年一樣，都是一個歷史長河中的年份。我們無法去否定遠古洪荒，亦同樣無法否定已經逝去的「現代史」，因為，他們都是已經逝去的「歷史」。

說通俗一點，所謂「歷史」就是愛倫坡《紅色假面舞會》裡那句耳熟能詳的名言：

「他們，都不見了。」

二

就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為敘述方便，下文將統一按此敘述）的研究方式而言，目前學術界並未對其提出明確的質疑或是界定。更多的學者用「二十世紀文學史」這個宏大命題來消解 1949 年這一時間分野，使得現當代文學史在同一個研究範式下進行。當然，我並非批評研究範式的多元化，在這裡，我想小心翼翼置喙的是：在名目繁多的研究方式中，有沒有更好的辦法，來分清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回答另一個問題：作為現當代文學分野的 1949 年，究竟在哪個層面上影響到了現當代文學的研究？

筆者拙以為，這一問題首當從「失蹤者」來回答。

所謂「失蹤者」便是後來文學研究者緘口不提的作家、作品、思潮與現象，誰也無法否認或逃避，現代文學短短三十年，誕生出了一大批巍巍在上的經典：魯迅、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葉聖陶、田漢……他們不但以英雄的表像出現在從小學到博士的教材裡，還以經典的扮相、大師的形象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呈現，遠看宛如復活節島上的巨石陣，使人不得不高山仰止、膜拜不已。縱觀中國古代、近代文學史，屈子歌賦，李杜詩篇以及三袁文章，有誰可與文學旗手魯迅先生相抗衡？

但是，與此同時也誕生出了一批失蹤者：邵洵美、李贊華、向培良、張資平、章克標、丁嘉樹、羅隆基、許君遠，甚至包括近十餘年之內「走紅」的梁實秋、周作人與張愛玲……與經典們不同在於，他們已然在之前甚至當下的研究界「失蹤」——其中絕大部分

人的文字、生平甚至姓名均不見於當下的任何資料。現代文學「失蹤者」何其多也，短短六十年，部分主流當代文學史研究者們「拐賣人口」的水平恐怕連最牛的人販子也難以望其項背。無怪乎一位本科生向一位現代文學碩士生導師請教「羅隆基是誰時」，這位老師竟汗如雨下，最後以「不該問的別問」草草收場。

勿怪這位老師水平低下，現代文學史中「不該問」的問題恐怕每一個文學史家心裡都有一本賬，被魯迅先生罵過的不該問、「國防文學」與「大眾文學」論戰時站錯隊伍的不該問、參加過「三民主義文學」與「民族主義文學」的也不該問，1949年之後被打成「右派」的更不該問，在前些年甚至連胡適、羅家倫與傅斯年都不該問——理由竟是：他們1949年之後去了臺灣。粗粗算下來，「該問」的也就只有從「左聯」的魯迅到「延安」的趙樹理等寥寥數人。不過，至於「左聯」，千萬也不該詳問，因為若有聰明點的學生問起魯迅罵周揚的原因，恐怕不知哪一位倒楣的老師又要「汗如雨下」了。

「失蹤者」如此之多，故為後來研究者平添許多困難。無怪乎研究者們常常感歎：文藝思潮研究常是「招頭去尾」，關注某個文學爭鳴最後才發現「有始無終」，史料研究到了一半斷了線，彷彿看懸疑小說看了高潮沒了下文。對於一些人或事，要麼被以「反動」、「政客」甚至「特務」冠之，要麼在官方的文學史裡索性不提——想當年，談唯美主義不提獅吼社，提民族文學不論及《現代文學評論》，研究民主黨派對現代文學體制的影響卻避開《絜茜》雜誌……凡此種種，竟已被之前的主流研究界視為常態。時至今日，與「極左時代」相比，話語環境確實寬鬆許多，某些話題相對已經不再是禁區，但是關於其史料也匱乏、散佚了。

在大量「失蹤者」產生的前提下研究現代文學，實際上違背了文學史研究的基本原則。所謂文學史研究，是歷史研究與文學研究

的跨學科結合，說細一點，歷史學研究方式是方法論基礎，而文學研究方式（如文本解讀、意識形態分析、審美分析）等等是在此基礎之上的樓閣，若無充分的歷史學研究訓練就貿然闖入文學史研究，好比是沒有學過解剖學的醫生給人動刀，導致的結果就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瞬間死亡」——因為一手資料一旦被發現，研究者就面臨不斷「被商榷」甚至「被否定」的結果，而被研究者卻因為各路英雄的「各樣研究」被塗抹到如京劇臉譜一般，越描越花，離真容越來越遠。

時至今日，現代文學研究被後學者視為畏途。相比之下，當代文學研究反倒成了一塊熱土。因為當代文學尤其是「新時期文學」屬於「紅旗下」甚至「春風裡」的文學創作，且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官方對於出版體制的管理尤為嚴格，尤其是新時期文學，少有被爭議之作，而且作家作品都好找到，並且健在者為多數，而現代文學恰恰與之相反——出版管理政策鬆動，多數刊物沒有「刊號」，作家學者編輯者們意識形態不一，且當時國內時局動盪、意識形態多元化，從文者們投延安毛澤東者有之，投重慶蔣介石者有之，投南京汪精衛者也有之。如此看來，大家都「棄現代」而「奔當代」便不足為奇了。

三

問題不言自明，1949年之於現當代文學最大的意義，便是導致無數「失蹤者」的產生。但是做現代文學研究的前提必須要像做歷史研究一樣「回到歷史現場」——即盡力找回這些失蹤者，若是找不到失蹤者，研究只能靠並不可靠的「二手資料」，而這卻是歷史研究中的大忌諱。因此，我常常天馬行空地遐想一個很有趣的問

題：若是有人故意（或是無意）在自己某篇論文裡造假史料，豈不是如多米諾骨牌一般，要害苦後面靠「二手資料」吃飯的人？

與我持同樣想法的人應不在少數，所以現代文學的風險之大，令許多研究者望而卻步。但與其他文學專業相比，現代文學的研究隊伍仍不可小覷，每年碩博畢業論文關於現代文學研究數以萬篇，洋洋灑灑涉及到他們可以觸及的各個角落，無怪乎錢理群教授稱現代文學為「貧瘠的礦區」——因為關於魯迅、郭沫若、老舍等作家的專題研究，已然成為「魯學」、「郭學」的龐大梯隊，甚至許多受他們影響的二三流作家也都相繼有了評傳、年表與相關研究專著。

但是事實上是，當下現代文學的研究狀況竟近似天文學界對宇宙研究狀況：對於已知的，耳熟能詳，成了常識；對於未知的，白紙一張，並且也懶得再去過問。因為，「現代文學」目前最為多見的三種研究方式，大大制約了該學科的發展。

第一種方式是「通史研究法」。此類研究法為國內各大高校、研究所在編寫教材時普遍採用，開口提五四，談到 1949 年就戛然而止，大體沿用之前已出版文學史的慣例，只看大局，不管細節，只說知道的、該說的，避諱不知道的、不該說的，從五四、創造社、左聯到抗戰再到延安文藝座談會一路下來，就是一本看似壯觀的現代文學史。進而大量現代文學史的出版導致現代文學研究界呈現出了如房地產界的虛假繁榮。

當然，這種研究法的最大好處就是洞觀全局，避免以偏概全的主觀性。但是這卻是一種非常簡便的研究法，就像是為中小學生編寫《上下五千年》一樣，並不需要豐富的史料與學科知識作為支撐，知道是常識，不知道是謎案，正所謂「子不語是非爭議」是也，找準一條歷史線索，趕知道的寫上去，這便是該研究方法所帶給後學者的困境。